

● 郑伟章

一代藏书校书宗师傅增湘

ABSTRACT Fu Zengxiang (1872-1949) loved ardently to collect ancient books. Editions collected by him of Song and Jin alone were 150 titles with 4600 volumes; those of Yuan were several score titles with more than 3700 volumes. He is a great scholar and his accomplishments are collation, black printing and bibliography. 55 refs.

SUBJECT TERMS Bibliophiles—Modern times Fu Zengxiang (1872-1949)—Academic accomplishments

CLASS NUMBER G250.92

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,有一个现象,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。明末清初当以毛晋、钱谦益、钱曾为代表,嘉道年间当以黄丕烈、吴騄、张金吾为代表,近代当以瞿、杨、陆、丁为代表。到了现代,其代表人物当首推傅增湘、叶德辉、杨守敬等人。尤其傅增湘先生,其双鉴楼藏书、校书影响甚大,堪称巨擘。现不揣简陋,略述其藏书、校书情况,以就教于方家。

一、傅增湘先生其人

傅增湘先生,字沅叔、润叔、号姜庵、姜弁、藏园居士,别署书潜、清泉逸叟、长春室主人、西峰老农、双鉴楼主人等,四川江安县人,在北平居石老娘胡同。生于清同治十一年(1872年)九月八日,卒于1949年10月20

日,终年78岁。幼入塾,后随父(傅世榕)宦游江浙等地。光绪六年(1880)始定居天津。光绪十四年(1888)17岁中顺天乡试,为考官、户部尚书翁同龢所赏识。光绪十六年(1890)入保定莲池书院,入桐城派古文大师、吴汝纶门下,醉心于桐城派古文。后入劳乃宣之幕6年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27岁中会试二甲第六名,选翰林院庶吉士。戊戌间与刘光第、杨锐等维新派人士接触,变法失败,六君子殉难,尝撰文力辨六君子之冤。尝入李鸿章之幕,与王士珍、段祺瑞、冯国璋等北洋派要人相识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)后,在天津创办北洋女子公学、北洋高等女学堂、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等。光绪三十四年,开设京师女子师范学堂,任总理。曾官贵州学政、直隶提学使。

辛亥革命发生,10月,参加北方唐绍仪和谈代表团南下,翌年4月和谈破裂,遂辞职

返居天津，旋至京居广化寺，借读京师图书馆藏书。1917年12月入王士珍、钱能训两内阁任教育总长。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发生，与当局政见不一，反对解散北京大学，遂愤而出走，自武汉抵扬、苏，旋即辞职。自是息影藏园，以藏书、校书、纂述自娱。1927年11月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。1929年11月至日本访书。1930年秋，在清华大学研究所讲授版本目录学。1936年初，应傅作义之邀，任《绥远通志》馆总纂。1938年撰成《通志》116卷。同年应聘为东方文化委员会副会长，为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撰稿。1944年4月患脑溢血卧床。1949年秋，应张元济之请，周总理派陈毅同志持函探望重病中的傅先生，未及相见他即不幸与世长辞了。傅先生早岁以鸿词起甲科，晚岁则从事学术活动，特别是藏书、校书，成绩卓著，堪称现代藏书、校书之宗师。

二、性命相依嗜藏书

中国著名藏书家往往是世代相传，后人受先人之濡染。傅先生亦不例外，受其祖父傅诚“锐意以收书为事”的影响颇深。然其先人留存之书并不多，仅元刊《资治通鉴》及普通寻常之本而已。

他搜书是从应举之时开始的。他说：“余幼而薰习，殆若性成。弱冠以来，无日不与书卷相新”^[1]。又说：“忆余觅举之时，即有嗜古之癖，凡原卷房书，多求旧刻，明文时墨，恒访名家。庚子之变，度置保阳，毁弃摧烧，一时俱尽，今插架所有，惟《钦定四书文》尚为官本。”^[2]从弱冠一直到40岁（即辛亥时），这个时期他搜书并不精。他说：“频年南北奔趋，广观博取，插架森然，四部之储略具，第四十岁以前，多缘求学所资，而吾家未有者为急，以云善本，殆未遑也。”^[3]

其大规模藏书及搜求善本则始自辛亥革命以后。他说：“逮辛亥年解组，旅居沪渚，得

交沈寐叟（增植——笔者）、杨邻苏（守敬——笔者）、缪艺风（荃孙——笔者）诸先辈，辄闻绪论，始知版本讎校之相资，而旧刻名钞之足贵。遂乃刻意搜罗，思有以绍承先绪。适有天幸，所求辄遂，往往无意而逢孤帙，或廉值而获奇珍。又雅好清游，长江左右，探幽选胜，筑屐经行，恒挟册自随，而归装所得，动且盈篋。耽玩既久，癖痼渐深，时遇可欣之品，希觐之编，轻者典衣，大者割庄，必收归帐秘而始快。”^[4]又说：“余自壬子（1912年）入都，即以锐意收书为事，耳目之所及，足迹之所经，古寺冷摊，时有奇遇，故家旧邸，亦得窥观。由是奇书秘册，半入庋藏，积月累年，日以充溢。”^[5]辛亥、壬子在上海参加和议期间，从苏州买到生平所收的第一部宋版书《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》，从杭州买到旧书数百册。张元济有跋语，鉴别这是四库进呈本。观其书，被馆臣窜易删落，已非旧观，由此更觉收藏善本的重要。至辛亥冬，他已购善本1000多册。以后，他或流连于琉璃厂、隆福寺书肆，或南下至扬州、南京、苏州、上海、杭州、宁波、歙县、高邮、宝应、常熟、绍兴等地探访秘籍。

他之所以成为现代藏书之宗师，是与他嗜书如命分不开的。余嘉锡评论他说：“闻人有异书，必从之假读。求之未得，得之未读，皇皇然如饥渴之于饮食，盖其好学天性然也。”^[6]他自己说：“顾手理缥緗，目寓铅槧，如寒之思衣，饥之思食，岑寂之思友朋，甚至如性命之相依倚，私自审度，殊不意如是其笃也。”“余生逢绝续之交，天予优闲，上自天府之储，下及私家所度，百宋千元，流观殆遍，视昔人之遭际，为幸已多，更独厚于余，举数百年来留貽之精粹，几经流转，总聚而付托焉，则鄙陋如余，思所以尽其责者，宁祇护持勿失而已哉！”^[7]又说：“所幸早获退休，性乐闲静，凡人世名位货利之欲，服御声伎之娱，百不挂怀。惟此简编，视同性命。缩食之资，倾于坊市，炳烛之耀，耗于丹铅。癖嗜既深，殆难自解。”^[8]

正是这种至笃的“嗜好”和“思所以尽其责”的责任感产生的强大力量,驱动着他如饥似渴、如痴如醉地献身藏书事业。他在1934年3月19日撰《明钞〈云台编〉跋》时,回忆起一件事:壬子(1912)三月,南北和谈结束,他买了新铭号船票,已登船待航返天津。此时忽有书友陈韞山来船码头找他,告诉新从金陵、苏州买到一批古籍。他打听到离开船尚有三四个小时,顾不得许多,就去选购书籍去了。他“尽发其篋笥”,买到《云台编》和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等十数种善本。等他“抱书疾走,抵埠四顾”时,“则船影渺然,盖鼓轮东发久矣”。这位和谈代表不得不再逗留四天,重新买票去天津。他接着写道:“今检书及此,聊述其事,知余年少气盛,嗜好专笃,闻有异书,如蚁之集膻,蛾之赴火,纵历艰难挫折,而曾不少恤。”^[9]

1934年,徐坊藏书散出,所藏宋监本《周易正义》,经宋俞琰,明唐寅,清季振宜、翁方纲、徐松、何绍基诸名家递藏,为惊人秘籍,然悬价高奇,殊骇物听。傅氏渴求已久,乃毅然举债一万三千元买下。他说:“虽古人之割一庄以易《汉书》,无此豪举也”。“一旦异宝来归,遂巍然为群经之弁冕,私衷宠幸,如膺九锡。”^[10]1944年,书贾送来宋蜀刻安仁赵谏议本《南华真经》。是书虽有多种宋本流传,然蜀刻仅此一见,未经古今书目著录,且经沈岩(宝砚)手校,怡府乐善堂、朱徵、张佩纶诸名家递藏。傅先生“披函展示,心目为开”,“忽睹异书,不免怦怦心动”,“倾城倾国,绝代未易再逢”,于是,亦毅然举债收之。他说:“视唐人所谓十金易一字、百金易一编者,殆有过焉。”“余于此书,虽负割庄之累,而忽增镇库之珍,亦可以此解嘲矣。”^[11]

他在资金困难的时候,常常采取舍去普通本而易善本、舍去一般善本而易善本之甲种的办法。他说,这是“舍鱼而取熊掌”。他财力有限,薪金所得,除维持生活所需之外,悉以购书。1928年,他就是以这样的办法买到

南宋内府写本《洪范政鉴》12册的。这套书“笔法清劲”,有唐人风格,桑皮玉版,厚如梵夹,蝶装旧式,有南宋内府铃印:“内府文玺”、“御府图书”、“缉熙殿书籍印”等,确为罕见珍宝。此书曾藏盛昱郁华阁,散出后为完颜景贤所得。傅先生梦寐以求十余年。一日,书贾忽携书来商,悬值绝高,“乃斥去日本、朝鲜古刻书三篋,得巨金而议竟成,舍鱼而取熊掌,余心固所甘焉。”^[12]1930年,傅先生为了还债,卖掉了一批书。适知徐坊之书散出,有宋版《魏书》64册,正可与宋版《南齐书》配成双璧,且好友张元济正勘正《二十四史》,可补其缺,乃不顾经济拮据毅然花去两千余元买下。

见一异书,他有一种必得的心理。他与缪荃孙老人争购顾千里校《嘉佑集》的事就很有趣。此书虽为明嘉靖刻本,但经顾千里据蒋篁亭校宋本手为订正,廓清数百年榛芜,光绪十五年(1889),李盛铎曾见诸京师,后不知下落。傅先生在辛亥南下参加和议期间,曾亲至苏州访问潘祖荫的弟弟潘祖年(仲午),亦未访到。这年腊月,扬州书贾陈韞山自江宁来沪,要报告先生已收得此书,适逢他到杭州访书未归。此书便为缪艺风老人索去。回来后,先生找缪氏索讨此书。老人提出,要以先生新收到的清平山堂本《夷坚志》相易。是书亦世所稀睹,先生不肯割弃,答应以后收到复本,当如约,缪氏不相信,以为“此愿恐河清难俟也”。没想到不出一个月,傅先生果然以重金又买到了一部《夷坚志》,欣喜过望,急抱书走送缪氏,终于要回了《嘉佑集》,也保住了自己原藏的《夷坚志》。缪氏对他说:“君雅重乡贤遗著,嗜此名校,竟如愿以偿。余两人于文字有夙缘矣!”先生时隔27年后追忆说:“余深感老人之高谊,因追怀当日交易授受原委,记之简末,为书林增一佳话,且藉以见余少年访书之勇,得书之难,尚冀后来得吾书者,珍惜护持,长留于天地间,庶不负前辈郑重相付之意云!”^[13]

共同的笃嗜,使他与数十个藏书家、目录

学家、版本学家和校勘家结成好友。在增加藏书、提高藏书质量,增进学识方面,他获益不小。他说:“一时同好者,争与赏奇析异,意兴飞腾。丹铅校勘,约为课程,杯酒往还,时得通假。邮筒之使,交影在途;文燕之欢,清谭彻旦。藏园岁暮祭书之典,与会者常数十君。或发为咏歌,或题诸典籍,风流胜概,传播长安。同时辈流萃萃可纪者,自德化夫子(李盛铎——笔者)以次,如董诵芬、章茗理、邓正暗、吴松邻、袁寒云、吴偶能、陶涉园、朱翼厂诸公,皆能穷搜博采,家富万签,常契古欢,乃修雅谊。”^[14]他交往的,除上列这些人外,还有张元济、杨守敬、王秉恩、顾麟士、徐乃昌、蒋汝藻、吴廷燮、王国维、朱希祖、叶德辉、邢之襄、刘承干、张钧衡、王献唐、刘启瑞、孙壮、陈垣、余嘉锡、周叔弢、刘文典、徐鸿宝、张允亮、沈兆奎、袁同礼、王重民、赵万里、谢国桢、赵元方、陈乃乾等。

他与这些人,或代购、通假书籍,或赏奇析疑,或探讨目录、版本、校勘等学问。他尤其风雅好事,每年岁终举行祭书之典,或得好书,随时燕集,歌咏飞觞,“风流胜概,传播长安”。1921年,他获宋版多种,甚喜悦,乃于小除夕为祭书之会,与会者10余人,徐星署以宋本《陆宣公奏议》、朱翼厂以宋本《汉官仪》来会,展玩竟夕,各咏诗以纪之。1922年,他买到宋、元本《五代史记》等12种,尤为铭心绝品,于腊月二十三日第五次举行祭书之会。1923年的祭书之典,李盛铎携来旧写本《清波杂志》、宋刊《纂图互注论语》,与会者七八人。1928年,他买到宋钞本《洪范政鉴》、明正德钞本《席上辅谈》、姚舜咨手钞《续玄怪录》等书抄校本及刻本12种,岁除前二日举行祭书之典,与会者8人。1930年3月,他买到渴求已久的宋衢州本《居士集》,乃燕集藏园,邀数人予会观赏题咏。1931年9月8日,傅先生六十初度,朱文钧手持所藏宋刊《册府元龟》、元刊《续通鉴》以为寿。这年的祭书会,到会者有80余岁的柯劭忞,70余岁的夏孙桐,

其他60至20岁的都有,章钰作《藏园祭书题词》。1923年买到宋建本王注《苏东坡诗集》,于东坡生日,邀集乡人,开宴藏园,互相欣赏,各题名于后。1933年8月,邀翰苑同人宴于藏园,出示上年所购明内府写本《翰苑群书》,夏孙桐作长诗以纪之,句云:“年年汐社呼旧侣,犹藉壶觞相嗅咻。羨君园林宜六隐,轮云高覆藏书楼。愿陈篋书恣纂录,百年坠绪宣沉幽。”但至暮年,因诸友凋零,这种风韵之事才告歇竭。1941年,他说:“岁月不居,忽忽已三十年,屈指前游,惟诵芬(董康——笔者)同年巍然尚在,余则先后凋零,有人往风微之感。”此时与他交往的仅徐森玉、沈无梦、张允亮等人,号称“藏园三友”。“是三君者,识力精能,见闻广博,频年搜讨,贻我实多。或偶逢罕秘,为目所未经,或创获珍奇,而力不克举,相与流传抄白,校定丹黄,时补佚文,共商旧学。”^[15]

数十年的倾心搜访,傅先生的藏书不仅数量上达到20万卷之多,而且其精罕程度为同时代之冠。满目琳琅,无不是孤本秘籍。每部书都是渊源有自,各有其罕秘精到之处,难以一一缕述。所藏尤以宋元本雄峙一时,而宋元明钞及名家校本、稿本更是网罗宏富。据其子傅忠谟统计,双鉴楼所收善本,宋金刊本有150种,4600余卷;元刊本数十种,3700余卷。其宋本之尤者为宋监本《周易正义》,钞本之尤者为宋内府写本《洪范政鉴》。

三、拚命校书与刻书

傅先生嗜好藏书不仅体现在藏上,更体现在校上。他说:“昔人谓藏书之家有三,而以读书者之藏书为足尚。余夙喜校讎,仰瞻卢、陆,拾补摭遗,嗣当有作。冀夺炳烛之微明,少裨学术,庶免玩物丧志,来骨董之讥耳。”^[16]又说:“余自辛、壬桑海之交,幸抛簪组,即嗜丹铅,二十余年,雪案萤窗,无时或间,手校之书,为部以千计,为卷以万

计。”^[17]余嘉锡先生说:“至于校讎之学,尤先生专门名家。平生所校书,于旧本不轻改,亦不曲徇;务求得古人之真面目,如段若膺所谓‘以郑还郑,以孔还孔’。其于向、歆父子虽未知何如,至于宋之刘原父、岳倦翁,清之何义门、顾千里,未之或能先也。”“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自校讎,丹黄不去手,砭砭穷日夜不休。凡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,皆已定,可缮写。”^[18]

傅先生校书始自入劳乃宣之幕。辛亥、壬子谈判归来,家居奉亲,日以丹铅自课,手校《唐人选唐诗》8种。以后校书益勤,每遇一书,无不网罗异本,或购或赠,或借或钞,都要亲加勘,辨其讹脱,校其异同,务使一书臻于完善。他说:“至于丹铅校录,志在毕生。前记所编已逾万卷,丁丑(1937)以后,游事渐稀,点勘群书,用以遣日,区区微尚,私淑何、卢,降及顾、黄,亦所向慕,偶逢诸家校本,尝事临逢,或亲古槧秘钞,为世稀见者,亦手加勘对,求其异同,正其讹脱,时复订一辞,而关大义,或乃异解,而破群疑,为役虽劳,而其乐无穷,积月累年,续校所得,又数千卷。”^[19]今读《群书题记》,几乎篇篇均载其所校文字,可见他校书之勤奋,真是“砭砭穷日夜不休”,同样亦是性命以之的。即使在战争年代,炮火连天,他也兀坐危城,丹铅不辍。1926年春,他校《苕溪集》,在朱古微校本的基础上,补其缺佚第十六、十七两卷,又校出佚文讹字689字。此时正发生战争,“兼旬以来,畿甸构兵,飞机投弹,巨炮轰天,都人惊恐,窜避无所。而余翻得此闲寂之暇,从事丹铅,日夜或数卷至十许卷,卒底于成。盖身际乱离,自维才力微薄,既无益于世人,惟拚命校讎,于古人微有匡正,庶差免虚生之诮耳。”^[20]1933年,他校《宋本周易要义》时,正是日本侵略军入关进攻北京,“时日军迫近郊,飞机翔空,潞河隐隐闻炮声,兵甲环城殆二十万。居民惶骇,携家四出窜避,留者一日数惊。余

兀坐危城,心情恶劣,殆不能堪”,但“嗜书如命,虽仓皇戎马之中,尚丹铅不辍于手,其痴绝宜可笑,而其孤怀微尚亦良足悲矣。”^[21]1928年,他的凌夫人病故,“意绪摧伤,无以遣日,乃锐志复理丹铅”,“外而朝政之翻复,内而家族之丧亡,所历惊心怵魄,劳神摧折之境,殆非人所堪”,每日摩挲卷帙,“日尽一二卷,多或至五六卷,校完《通典》140卷”^[22]。

尤其致力最勤的,是他校《文苑英华》一千卷。“严定课程”,“日以二卷为率”,“日晷不足,则继之以深宵,人事相缠,则避之别馆”。“独于古籍之缘,校讎之业,深嗜笃好,似挟有生以俱来,如寒之索衣,饥之思食,无一日之可离”。“灯右讎书,研朱细读,每日率竟千行,细楷动逾数百,连宵彻旦,习以为常,严寒则十指如椎,焯暑则双睛为瞀,强自支厉,不敢告度。家人讽以自休,曾不之恤,即默念何以自苦如此,而亦无以自解。誉我者谓为不朽之盛事,笑我者斥为冷淡之生涯,吾惟力行,以践吾言,独乐而忘其苦,遑议其他哉!”^[23]

傅先生主张校讎要广罗众本。他说:“凡得古书,广罗众本,寻讨源流,博观详审,方能辨其良楮”^[24]。比如元朝著名文学家戴表元的《剡源文集》,至清朝郁松年刻入《宜稼堂丛书》,文字讹谬颇多。沈炳垣曾纠摘订讹,所据为黄宗羲之文钞刊本及何义门假毛扆旧藏钞本。傅先生收到沈校本,觉得待正之处尚多,“于是博访旁咨,南北所见,凡有三本,更就沈校,重事披寻”,“与之符同者十之六七,弥其罅漏者十之三四。绌绎之余,私自矜许,意谓搜讨无遗,庶几正定可传矣”。没想到偶然从友人处忽见旧刊六卷、钞白二册,为洪武初年太学始刊之本。取以校通行郁本,“差误之字几于无篇无之”,脱去佚文亦甚多。傅先生说:“今乃忽逢孤本,兼补佚篇,既喜得举世不见之书,更以完前人未竟之绪”,“余于剡源之文,凡涉历十有七年,广罗异本,

至再至三，讫于今兹，续有创获，拾遗补坠，粗竟前功”^[25]。他所校之书，无不是广罗众本，自宋元槧以至明清刻本、钞校本，互为比勘，务使一书尽善尽美。

他提出，校书不要笃信前人。宋元本、旧本、前人校本当然是最重要的，最为他所重视。他说：“昔人谓不尽观天下书，慎勿妄下雌黄。余更为之进一解曰：‘读书不得旧本，慎勿言校勘。’”^[26]但是，“他认为一味迷信前人就不对了。比如，顾千里是清嘉庆、道光年间的校刊名家，人们以为廖氏题襟馆所刊《华阳国志》，是经过顾氏手校过的，“要为定正可传也”。然而，傅先生发现，顾氏所据仅冯氏空居阁本、钱馨室写本、何义门校本，于明代嘉靖以前旧刻似未寓目。傅先生借北图新收明嘉靖甲子刘大昌刻本与顾校廖刻本对勘，全书订正之字多至400多个。他说：“昔黄尧圃校书，多兼收众本，一书手勘至于再三，不憚其烦，所谓遇本即校也。余更为之进一解曰，凡校书之法，切勿笃信前人。世人偶得名家校刊之书，辄笃守其本，谓已决无罅漏，岂知异钞秘槧，海内方迭出不穷，吾辈览玩之所及，或为昔人耳目所未经，刻意寻求，往往后来居上，正不必吝于前贤而自划也。”^[27]他在校黄丕烈士礼居据朱竹垞旧藏宋本翻雕之《舆地广记》时，发现“其异字正复不少”，说：“夫尧圃刊书，号为精审，又得顾千里为之雠勘，而拾遗补缺，犹有待于后人。然则世之善读者慎勿震于昔贤而故步自封可也。”^[28]他在校吴騫拜经楼据卢文弨校宋本重刊之《谢宣城集》时，也发现“可议者亦正多”，“余维兔床以校勘名家，岂宜疏失至此。及详玩其跋语，则彼等取卢文弨传校之本以锓木，实未尝亲见宋刻也。……第就传本移写，又拘于丛书之版式而为之，故行款既非古式，又刺取考订异文缀于本句下，以云翻宋，实为非体。其它提行、空格、标题、夹注，一切皆失旧观，书经三写，焉乌帝虎，自所难免，况又移改格式以滋其误

耶！”^[29]这样的例子还很多。古籍一到他的手里，无论是通行本，还是名家校本，他都能发现许多错讹，一一加以校正，或辨讹字，或补佚文，使还旧观。

他也反对轻视普通本、明清刻本或传钞本。他说：“盖宋本虽古，未必可尽从。明刻虽晚，亦不无可取。是要在善校、善读者而已。”比如《荀子》一书，人们重视北宋监本、南宋江西漕本、台州复监本，而轻视纂图互注本，认为“出于闽中坊肆，宜不足为重”。实际取以校“近世咸推善刻”的明顾氏世德堂“六子”本，“则世德堂本之讹夺赖以补正者乃正伙”，其“佳胜之处，尤难以缕指而计”。他说：“昔颜黄门有言，‘学者不尽读天下书，慎勿轻下雌黄。’今世不乏耽书嗜古之人，然版刻之源流未究于心，丹铅之校订未亲于手，偶睹标题，乍披卷帙，辄侈口而言曰：‘此麻沙陋刻，坊市恶书也。’岂知披沙拣金，往往得宝，顽璞之剖，实蕴连城。……余以纂图互注之书久为大雅所不屑道，然既感于王伯厚之言，又手勘其文字之异，始知书坊所梓，亦时有较胄监为优者”。^[30]即使是《玄怪录》、《述异记》一类小说家言，向不被人重视，“以其不关宏旨，无裨实用”，先生也不轻视，“不憚繁屑，穷日力以从事于此”，“明知为大雅所讥，亦不遑恤也”^[31]。

他主张校书要实事求是，不轻改一字。他在校《文苑英华》时说：“吾尝闻清益公（宋周密）之言矣，其言曰：‘校书之法，实事求是，多闻阙疑。’故余之校明本也，凡改订之字，必据他本以著其异同，有疑误之端，则待他书以详为考证，不欲轻改一字，不敢臆断一词。盖只有订讹补逸之功，而详考博辨之事留以俟后人之论定，如是而已。”^[32]他主张撰写校勘记，在校勘记里加以订正、说明，详其异字、疑字、脱讹、脱句、脱行、补注、错简、脱篇、脱叶、补校记、补撰人等。他除在每书题记里附以校记性文字外，又撰写40余篇单篇校记，仅《文苑英华》增改删乙

就达四五万言,落实到文字上有数十万言。他一生所校之书达797种,16301卷。古人云,“读书破万卷”,先生则“校书破万卷”,其学识、其精神真是超迈往古。

同所有著名藏书家一样,傅先生亦喜刻书。所刻有《双鉴楼丛书》10种、《蜀贤丛书》12种,单行本有影宋本《周易正义》、《方言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皇甫持正文集》,影元本《困学纪闻》,影印《永乐大典》两卷等近10种。他还将自己所藏善本借给张元济涵芬楼印入《四部丛刊》初编、《四部丛刊》续编及《续古逸丛书》。其他如朱祖谋、董康、陶湘、徐世昌、吴昌绶等都向他借书刊刻。他重视乡邦文献,从1928年到1943年,前后花了16年时间,搜辑四川作者450余人的作品2600余篇,汇成《宋代蜀文辑存》一百卷,并刊刻行世。

四、“海内外之言目录者靡不以先生为宗”

傅先生不但为现代藏书、校书之宗,于目录、版本之学亦为一代之宗。他自己说:“余自中年以后,习为目录之学,凡古来载籍,必穷披广览,以考其存佚之原”。^[33]伦明曾评论:“江安傅沅叔先生……比年南游江浙,东泛日本,海内外公私图籍靡不涉目,海内外之言目录者靡不以先生为宗。”^[34]余嘉锡评论说,明清之际的毛、钱曾以收藏鉴赏名家,他们的书目只是“记板本之异,不过‘欣然规往’、‘山中一半雨’之类,用为标帜而已”。黄丕烈“尤以佞宋沾沾自喜,群推为藏书大家,而其所作题跋,第侈陈所得宋、元本楮墨之精,装潢之美,索价几何,酬值几许,费银几两、钱几缗,言之津津,若有余味,颇类卖绢牙郎,至于此书何为而作,板本之可资考证者安在,文字之可供雠校者谓何?则不能知也。”即使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虽能言作者之旨意,为刘向以后仅有之书,“然

殊不及板本,于校雠亦略而不详,则犹未为尽善。其他家书目盖无足道者。”而傅先生则不一样,于书“如贪夫之陇百货,奇珍异宝,竹头木屑,细大不捐,手权轻重,自辨真赝,人不能为毫发欺。盖其见之者博,故纂之也详。吾尝侍坐于先生,闻其谈板本异同,如数家珍。有以书来者,望而知为何时、何地所刻,几于暗中摸索能别妍者”。故其所作题跋,“于板本、校雠二者,自道其所得,实能开自来目录家所未有”,“此岂他藏书家徒以收藏赏鉴名家者所能企及者哉!”“四部九流,无所不备,以视陈仲鱼《经籍跋文》,精密相似,而博瞻过之矣”。^[35]余先生的评价,对毛扆、钱曾、黄丕烈未免有贬斥过低之嫌,然对傅先生在版本、目录学上的独到之处评价是公允的。

傅先生的目录学代表作是《藏园群书题记》。数十年间,他撰题记近700篇。1935年以前所撰曾在天津《国闻周报》连载,后辑刊成《藏园群书题记初集》八卷。1935年至1938年所撰,辑印为续六卷。1938年至1944年所撰编成《三集》八卷。1981年,其孙傅熹年重加整理编辑,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合订本,85万字,收入580篇。他1930年12月曾刊《双鉴楼藏书续记》两册,朱红本,搜聚这一年所收善本书题记56篇,大多荟入上书,然亦有约20篇未收入,不知何故。他的这些题记,“叙板本之同异,辨字句之讹谬,烛照数计,既精且博。至于撰人仕履,著书旨意,必详人所不能详,其常见者则略焉”。^[36]通读全书,内容极为丰富,其精深渊博,使人如入宝山,美不胜收。

其所撰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5册,已由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,118万字,也是现代著名的目录学著作之一。傅先生数十年南北访书,必携带笔记,平生所见数十万卷古籍,大都择优记录下来,题名为《藏园瞥记》或《藏园经眼录》,积至40余册,小有散佚,现存38册,录书5000种,近代流传重要善本基本包

括在内,是了解近代所存善本概貌及流传、佚存情况的重要著作。傅先生尝自谓“近代书籍之源流大率具于是矣”。^[37]“其中秘籍异书尤复不鲜,大足为后来考订之资”,“亦称书林之巨观”。^[38]

《双鉴楼主人补记莫氏知见传本书目》4卷,稿本。这是他在访书时,随带莫友芝《吕亭知见传本书目》,把各书行款、牌记、序跋摘要记录其上。他的这些记录也是寻访、辨别古籍的重要资料。邵友诚在增订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》时,曾借傅先生的稿本录副,补其所未备达891条之多。新近该书由中华书局影印抄写本。

《藏园东游别录》4卷。这是傅先生1929至1930年去日本访书时的记录,包括日本宫内省图书寮、内阁文库、岩崎氏静嘉堂、内藤氏恭仁山庄、前田氏尊经阁和西京诸古刹的藏本。这是继杨守敬《日本访书志》、董康《书舶庸谭》之后,有关日本现存中文古籍知见情况的重要著作。

此外尚有《藏园校书录》4卷,稿本,收录了1893至1944年校勘诸书的记录。《藏园校记》,稿本,汇编了50种重要古籍的校勘记。《藏园序跋集录》,稿本,亦有关典籍源流、考证。其他如《藏园遗稿》(油印本)、《双鉴楼藏书杂咏》、《藏园日记钞》、《藏园六十自述》、《藏园七十自述》等,无不与访书、校书、目录版本之学有关。

他的藏书目录,有《双鉴楼善本书目》四卷,1929年自刊蓝格本,著录1929年以前所收善本书1287种,35000余卷。《藏园续收善本书目》4卷,稿本,著录1931年以后所收善本280种。《双鉴楼珍藏宋金元秘本目录》,稿本,著录所藏最善本169种,6955卷。惜无藏书总目,今已无由睹其藏书盛况之全貌。傅先生十分重视编撰藏书目录,曾说:“且历观近代胜流,若盛意园、端旬斋、徐梧生诸公,当其盛时,家富万签,名声烜赫,駸駸与南瞿北杨齐驱方驾。而鼎革未几,楹书咸佚,求其家藏

簿籍,渺不可得,未尝不叹风流之易歇,而吾辈守先待后,勤勤著录之愈不容已也。”^[39]不知何故,先生仅撰数百篇藏书题记及善本书目多种,而无总目。

五、藏书处、藏书印及

藏书散佚、流传

傅先生的藏书处“有山石花木之胜,取东坡‘万人如海一身藏’之句,颜之曰‘藏园’”^[40]。藏园之内有双鉴楼,其祖父官金陵时得元刊《资治通鉴》胡注,是其家“藏书之鼻祖”;他自己于1916年得到一部百衲宋本《资治通鉴》。二书“后先辉映”,因“敬题藏书之所曰双鉴楼,并援堯翁之例,别写得书图,征求通人题咏”。^[41]1928年,他得到南宋内府写本《洪范政鉴》后,就以此取代元本,仍称双鉴楼。藏园内还有长春室、食字斋、池北书堂、龙龕精舍、莱娱室、抱素书屋、企麟轩等。

其藏书印有:“傅增湘印”白文方印、“沅舫”朱文方印、“江安傅氏藏园审定书籍之记”、“江安傅氏藏园鉴定书籍之记”、“江安傅增湘字沅叔别号藏园”、“沅叔审定宋本”、“江安傅沅叔考藏善本”、“傅沅叔藏书记”、“江安傅增湘沅叔珍藏”、“傅增湘读书”、“江安傅沅叔收藏善本”、“藏园秘籍”、“藏园秘籍孤本”、“藏园”、“藏园居士”、“藏园老人”、“双鉴楼主人”白文方印、“双鉴楼藏书记”、“双鉴楼珍藏印”、“双鉴楼”、“双鉴楼主人珍藏宋本”、“龙龕精舍”、“莱娱室印”、“企麟轩”、“长春室”、“书潜”朱文方印等。其子傅忠谟的印记有:“忠谟继鉴”、“江安傅忠谟晋生珍藏”等。

傅先生在聚书的过程中有一个观点,就是要善于役书,不要为书所役。故他经常“随弃随收”,“每慨黄尧圃,张月霄辈汲汲一世,晚岁乃空诸一切,盖由役于物而不知役物,卒以自困”^[42]。他第一次卖书是1913年。上年因造屋及大批购书“两项费用过巨,年底乃太窘,举千金之债乃得度岁”^[43]。他共负债六千

元,不得已,于1913年4月14日致函张元济说:“敝处历年搜集明代诗文集约三百余种……其种类虽不及松山(贵阳陈田——笔者)之富,然亦有松山所不见者数十种”,“思将此种集部廉价售出,以凑还债项”。他希望商务印书馆买下,或介绍友人收之亦可。当时日本书贾田中庆亦欲索购,先生不肯卖给外国人。他说,若“商务”买下,“尚可随时到馆假阅,较弃之海外、踵松山之后尘者,为计良胜”^[44]。第二次大批卖书是1928年。5年来,他积债至3万余元,每年付息就需4000元,本想卖掉京宅而无买主,“于是,不得不出于卖书一途”。这次他卖出3万元的书,亦同样不肯卖给外国人,虽可得善价,“然数十年精力所聚,而举以委之外人,私心固所不欲”。这次卖书范围很广,表示“无论宋元钞校及明刊精本,均可割爱”^[45]。第三次卖书规模亦大,是在1930年。他在致张元济的信里表示,如果潘宗周“能出四万元之值,则所藏宋本可令其选购,但其中有十数种不售”^[46],甚至其所藏宋版《资治通鉴》亦可以万元卖出^[47]。第四次在1932年。这年“积欠银行之款又增至二万二千元,急欲设法清偿,舍去书外更无办法,拟售善本书一万元,普通书一万二千元(清人集有二十余箱)”^[48]。第五次在1933年。他说:“藏书不能终守,自古已然。吾辈际此乱世,此等身外物为累已甚,兼以负债日深,势非斥去一部分不可”^[49]。这次因欠债并不算多,因之卖书亦不多^[50]。1939年,他曾以13000元买来的宋监本《周易正义》也让出还债,“后顾茫茫,莫之为计”。1944年,他为筹印《宋代蜀文辑存》,售出宋元本及抄校善本100种。1947年,又先后将宋景佑本《史记》、宋蜀本《南华真经》及明刊善本百种、名人钞校本售予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平图书馆。1948年,琉璃厂书肆多文阁、文渊阁、修文堂、来薰阁四家合资购其藏书一批,其中有宋版《苏诗》、宋版《周礼》等^[51]。此外,他的藏书在1917年夏曾遭大水,寓内水深两尺,及时“以重价买舟”,

“将宋元钞校及各种计四十箱运出”,损失不大^[52]。

尽管有上述多次卖书,双鉴楼藏书精华及规模仍很可观。他有一个观点,认为“文章公器,非可自私”,“又焉知今日矜为帐秘者,他日宁不委之覆瓿耶”。纵观历史,所谓“神物护持”,殆成虚语,“信知私家之守,不敌公库之藏矣”^[53]。他决心把藏书和手校之书捐入公库。1946年底,他致函张元济:“逖者以徇儿辈之请,拟将藏园校定群书移赠北平图书馆,公诸于世,借留鸿印。因将各书取出,手自检点,约有二十余篋”^[54]。翌年7月,即将书籍373部、4300余册捐入北平图书馆,将普通本捐入四川大学图书馆。卒后,1950年其长子傅忠谟秉承遗志,再将手校之书480种,3500册捐入北京图书馆。至1957年,傅忠谟将普通本一批售于中国书店,学者袁行云购得殿本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《孟子》注疏,为傅先生手校^[55]。至此,藏园群书即散之殆尽。

参考文献

- 1,3,4,7,16,39 傅增湘.双鉴楼善本书目序.见:藏园群书题记,上海古籍出版社.
- 2 傅增湘.藏园遗稿.方百川先生跋
5,9~15,17,20~32,41 傅增湘.藏园群书题记.上海古籍出版社.
- 6,18,35,36,40 余嘉锡.《藏园群书题记续集》叙.见:同1
- 8,53 傅增湘.双鉴楼藏书续记序.见:同1
- 19 傅增湘.藏园居士七十自述
- 33 傅增湘.《宋代蜀文辑存》序.见:同1
- 34,42 伦明.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·傅增湘
- 37,38,43~51,54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牋.商务印书馆
- 52 艺风堂友朋书札.下册
- 55 袁行云.补伦明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后.手稿

郑伟章 196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。现在中央机关工作。已发文数十篇,出版专著5种。通讯地址:本刊转。

(来稿时间:1994-02-05. 编发者:刘喜申。)